



## 玄奘生平史料七種綜述

陳士強

今存的記叙玄奘生平事蹟的資料主要有七種：一、唐玄奘口述、辯機筆受的《大唐西域記》十二卷；二、唐道宣《大唐內典錄》卷五《玄奘傳》；三、唐道宣《續高僧傳》卷四《玄奘傳》；四、唐靖邁《古今譯經圖記》卷四《玄奘傳》；五、唐慧立、彥棕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十卷；六、唐冥祥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一卷；七、唐佚名《口口寺沙門玄奘上表記》一卷。這些資料的記叙各有側重，而且並非全然一致，今據筆者所閱，作一粗略的介紹，以供有志者作進一步的深入的研究。

一、《大唐西域記》。據唐慧立、彥棕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卷六記載，唐貞觀十九年(645)春正月，玄奘費經像回到長安，隨後前往洛陽，謁見唐太宗。唐太宗仔細地向他詢問了西行路上的所見聽聞，「並博望之所不傳，班(班固)馬(司馬

遷)無得而載」，太宗對此很感興趣，因而對他說：「佛國遐遠，靈蹟法教，前史不能委詳，師既親睹，宜修一傳，以示未聞。」玄奘回到長安以後，一邊組建譯場，創譯《菩薩藏經》、《佛地經》、《六門陀羅尼經》、《顯揚聖教論》、《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》等等一批梵文佛經(凡五部五十八卷)，一邊由他自己口述、弟子辯機筆受，撰《大唐西域記》，貞觀二十年(646)七月撰成進呈。全書共記述了玄奘於貞觀三年(629)發自高昌，杖錫西行，周游印度各地，參學巡禮，最後費經回國的漫長旅程中，所經行的百一拾個國家和聽聞所得的廿八個國家的情況。內容包括：這些國家的名稱、方位、疆域、地形、城廓、居室、種族、刑政、兵制、賦稅、貨幣、言語、文字、教育、歲時、衣飾、饌食、禮儀、風習、氣候、田畜、物產，以及名勝古蹟、人物傳說、歷史掌故、宗教信仰(尤其是佛教信仰)等。此書大體上是按玄奘取經時經行的路線記述的，但在經行國家的先

後順序上，與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存在着一定的差異。

如據《西域記》卷一的記載，玄奘到了羯霜那國之後，即去縛喝國（縛喝國之前記敘的睹貨邏國故地因是聽聞國，故不在經行的路線之內）。而據《慈恩傳》卷二的記載，玄奘到羯霜那國之後，先去活國，再去縛喝國。《西域記》卷十在奔那伐彈那國之後，所記敘的國家依次是：迦摩縷波國——三摩呬吒國及以東六國（聽聞國）——耽摩栗底國——羯羅拏蘇伐刺那國——烏荼國。而《慈恩傳》卷四則為：羯羅拏蘇伐刺那國——三摩呬吒國及以東六國（聽聞國）——耽摩栗底國——僧伽羅國（聽聞國）——烏荼國，沒有迦摩縷波國，而且是先到羯羅拏蘇伐刺那國，再到耽摩栗底國，而不是相反；至於《西域記》卷十一記載的從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到伐刺拏國，沿途經行的國家，與《慈恩傳》卷四、卷五所記，更是大相徑庭。

二、《大唐內典錄·玄奘傳》。此傳作於唐麟德元年（664），作者道宣是玄奘的弟子，曾參與佛經的翻譯。由於《大唐內典錄》的體裁是佛經目錄，故作者在記敘玄奘的生平事蹟時，主要記敘的是他翻譯的佛經的名目部卷，但統計不全，連同《大唐西域記》在內，只有「六十七部一千三百四十四卷」。

三、《續高僧傳·玄奘傳》。此傳作於唐麟德二年（665），《西域記》只記玄奘西行取經及回歸時所經行或聽聞的西域國家。而此傳則前記玄奘的生世、出家、求學、行化，中記玄奘的西域行程，末記玄奘歸國以後的譯經活動，首尾完整，其資料既有取於《西域記》的，也有取於玄奘的表狀的，還有根據玄奘平時的講述加進去的。書中所記玄奘翻譯的經論名目，「總有七十

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」，雖未列出具體的經名，但其總數顯然較《內典錄》有了增加，從而表明作者已對《內典錄》的記載作了修正。

四、《古今譯經圖紀·玄奘傳》。《古今譯經圖紀》約作於麟德二年（664）。當時長安大慈恩寺翻經院為紀念玄奘的譯經功績，在牆上畫了歷代佛經翻譯家的圖像，始自東漢的迦葉摩騰，終於唐代的玄奘。作者靖邁既為玄奘的弟子，便受命為每幅圖像配寫了人物小傳。但由於這些人物小傳屬題記性質，故對人物的生平行歷着墨不多，而對他們的譯典則一一具列。傳中所錄的玄奘譯經數目，「除《西域記》，總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」。這個數目較為準確，因而為後代的佛經目錄如唐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等所採納。

五、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。又名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、《三藏法師傳》、《慈恩傳》，十卷。唐麟德元年（664），魏國西寺沙門慧立初撰；垂拱四年（688），弘福寺沙門彥悰續成。故書題「唐沙門慧立本、釋彥悰箋」。慧立，與前面提到的辯機、道宣、靖邁，以及棲玄、明璿、行友、道卓、玄則共為玄奘譯場的「綴文大德」，參預譯經積十九年之久。故彥悰《序》說：「（慧立）睹三藏（指玄奘）之學行，矚三藏之形儀，贊之仰之，彌堅彌遠，因修撰其事，以貽終古。及削稿云畢，虐遺諸美，遂藏之地府，代莫得聞。爾後役思纏痼，氣懸鍾漏，及顧命門徒掘以啓之，將出而卒。」也就是說，早在玄奘在世的時候，慧立已在私下編錄玄奘的事蹟，至玄奘去世時已勒成初稿。由於擔心所記或有不周之處，會引起同門長幼的非議，故將書稿包起來，埋藏於地下，一直到自己身患重病，奄奄一息



時，才向自己的門徒交代，叫他們將書稿挖出來，遺憾的是，書稿還未挖出，慧立便絕氣身亡。取出後的書稿經眾人傳閱，逐漸流散，相隔了好幾年，才有門人搜集齊全。由於慧立的稿本主要記述的是玄奘的身世、出家前後的經歷以及西域之行，沒有記述玄奘回國以後的譯經活動，故慧立的門人祈請彥悰作序，並加以賡續，於是始有今本《慈恩傳》。

今本《慈恩傳》的前五卷是慧立寫的，不過所記當以玄奘於貞觀十九年春正月從西域回到長安為止（即第六卷起首「釋彥悰述曰」之前的文字），但在文字上已經彥悰修改；後五卷基本上是彥悰新撰的，不過卷十之末所載的慧立的「論贊」（對全書內容的總的評論），原先當在慧立初撰的五卷本的末尾，是彥悰在補續時將它們移至卷十之末的。

《慈恩傳》與《西域記》在內容上有一定的聯繫。《慈恩傳》在撰作時曾參閱過《西域記》，並採用了《西域記》中對西域各國名稱的新譯，以及部分資料。《慈恩傳》卷四在記述僧伽羅國和摩臘婆國時兩次出現「語在《西域記》」的說法，便是其中的一個證據。但《慈恩傳》關於玄奘西域之行的敘錄，並不是根據《西域記》改編而成的，而是直接借助於慧立從玄奘的講叙中所獲得的資料編纂起來的。因為《慈恩傳》中雖然也有玄奘親踐或聽聞的西域各國的山川地理、風物人情、宗教信仰、佛教名勝遺蹟，以及歷史傳說等等的記載，對勘後，可知是參考《西域記》而扼述的。但它的重點不是記國（《西域記》卷一、卷三、卷四、卷七、卷十凡有十二國未見於《慈恩傳》），而是記人，即玄奘的行事，諸如玄奘在哪一國，遇到過甚麼人和甚麼事，瞻仰過何處聖蹟，求學過哪位大師，以及其他活動，而這些情況，

大半為《西域記》所不載。而且有關玄奘的行徑次第和路線也敘述得更為清晰。有些記載也與《西域記》不同，關於這一點已在前面提及了。

但《慈恩傳》也有不足之處。如對玄奘的生卒年缺乏前後一致的記載。若據卷一「法師年滿二十，即以武德五年於成都受具（具足戒）」的說法，則玄奘生於仁壽三年（603）；若據同卷玄奘在貞觀三年出發西行，「時年二十六」的說法，則玄奘生於仁壽四年（604）；若據卷十玄奘在龍朔三年（663）對諸僧說的「玄奘今年六十有五，必當卒命於此伽藍（指玉華宮，又稱『玉華寺』）」，則玄奘生於開皇十九年（599）。生年既不一致，卒時的歲數自然也難以確定。這種情況雖然也存在於《續高僧傳·玄奘傳》之中，但它中間有一說倒是可以肯定的，即「麟德元年，（玄奘）告翻經僧及門人曰：有為法必歸磨滅，泡幻形質何得久停？行年六十五矣，必卒於玉華。」此話的意思與《慈恩傳》所記大致相同，但時間上有出入。相比之下，《續高僧傳·玄奘傳》將說話的時間定為玄奘去世的當年，即麟德元年（665）較為合理。據此，玄奘的生年應是開皇二十年（600），卒時六十五歲。

另外，據《續高僧傳·玄奘傳》記載，玄奘曾奉唐太宗之命，將《老子》譯成梵文，傳之西域。又將《大乘起信論》從漢文還譯為梵文，使之流布天竺。此二事，《慈恩傳》也脫漏未載。

六、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》。這篇《行狀》的作者冥祥是唐高宗時人，曾參加過玄奘的葬禮，但他與玄奘之間沒有師徒關係。《行狀》全文約一萬一千字，比《續高僧傳·玄奘傳》

少七千字左右。通過對勘發現，《行狀》實是以《慈恩傳》十卷本為底本改寫而成的，因而可以確定為是垂拱四年(688)以後寫的。《行狀》雖然本於《慈恩傳》，但敘述簡潔明了，易於閱讀。有些地方糅入了《續高僧傳·玄奘傳》的記載，以及冥祥個人的新提法。如說玄奘在東都淨土道場為師複述，「時年十五」；武德五年，玄奘「年二十有一」；貞觀三年，「時年二十九」等，均是以《續高僧傳·玄奘傳》的說法而取代《慈恩傳》之說的。至於玄奘在蜀地「四五年間，究通諸部」的「四五年間」，則是冥祥的新說。另外，《行狀》中也引用了玄奘臨終前說的話：「今麟德元年，吾行年六十有三，必卒於玉華」中的「六十有三」疑是「六十有五」之誤。

七、《口口寺沙門玄奘上表記》。略稱《玄奘上表記》。此書今存的原本為日本小泉策太郎收藏的唐代手鈔本，在我國已經失傳。書首脫落兩個字，從書中收載的最後一篇奏表《請御制大般若經序表》所署的「龍朔三年十一月廿二日坊州宣(宜)君懸(縣)玉華寺沙門上表」等句來看，脫落的當是「玉華」兩字，故它的全稱當是《玉華寺沙門玄奘上表記》。由於書中所載的表啓與敕答的名稱，凡涉及李世民的，一般稱「太宗文皇帝」，而涉及李治的則直稱「皇帝」，而不稱廟號「高宗」。以此推斷，編集的時間大致上在高宗麟德元年(664)二月五日玄奘去世以後不久，編集者很可能是玄奘的弟子。此書共收錄表敕四十一篇，其中玄奘在唐太宗朝的上表十一篇，在高宗朝的上表二十三篇，太宗的敕書四篇，高宗的敕書三篇(內有詩一首)。

《玄奘上表記》的前部分，即玄奘在唐太宗朝的上表和唐太宗的敕答，與一部題名為《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啓》(一卷)的

書相同。《表啓》是日本奈良時代寫的京都知恩院藏本，《玄奘上表記》與之相異的有兩點：一《表啓》的首篇是貞觀二十年七月十三日的《進經論等表》，而《玄奘上表記》則缺此篇；二、《表啓》所收的各篇表啓都署有貞觀某年某月某日上表的具體日期，而《玄奘上表記》則無。今本《玄奘上表記》(指《大正藏》收錄之本)將《表啓》中的《進經論等表》補入，作為首篇，而將《上表記》原先的首篇《進西域記表》改列為第二。這樣，人們通常見到的《大正藏》中收錄的《玄奘上表記》實收表詔是四十三篇。

《玄奘上表記》對於研究玄奘從印度學成回國後的主要活動，特別是自貞觀二十二年(646)至龍朔三年(663)的十八年間的譯經、交往以及晚年的思想，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。其中有些表啓的內容與《慈恩傳》敘錄不一，可資參比。有些表啓則為《玄奘上表記》獨家所有，可補《慈恩傳》之闕遺。如《玄奘上表記》所收的《進經論等表》，也見載於《慈恩傳》。但兩書所載的同一篇章，除新譯的五部經論的名目卷數是一致的以外，其餘的前言後語全異，即是其中的一例。然而，由於《玄奘上表記》在編集時省略了各篇表啓的上表時間(最後一篇除外)，故它又必須借助於《慈恩傳》等的記載，方能考定時間。另外，它只是收錄了玄奘上表的一部分，而非全部。

除上述七種有關玄奘生平事蹟的史料以外，記載玄奘譯經名目的，還有唐代靜泰於麟德二年(665)編的《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》，所記與《古今譯經圖紀·玄奘傳》相同，也是「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」。稍晚的還有唐代劉軻撰的《塔銘》。